

基于自动识别的委婉语历时性发展变化与社会共变研究

张辰麟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省
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
云南语言智能研究中心/ 云南省
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237号
shichiyateana@126.com

王明文*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省
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
mwwang@jxnu.edu.cn

摘要

本文主要以汉语委婉语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大量人工标注，借助机器学习有监督分类方法，实现了较高精度的委婉语自动识别，并基于此对1946年-2017年的《人民日报》中的委婉语历时变化发展情况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从大规模数据的角度探讨委婉语历时性发展变化、委婉语与社会之间的共变关系，验证了语言的格雷什姆规律与更新规律。

关键词： 委婉语；自动识别；历时语言学；语言与社会共变关系

A Study o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variance of Euphemism Based on Automatic Recognition

Chenlin Zhang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 No. 99,
Ziyang Avenue, Nanchang, Jiangxi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Intelligence
of Yunnan / No.237, Longquan Avenue,
Kunming, Yunnan
shichiyateana@126.com

Mingwen Wang*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 No. 99,
Ziyang Avenue, Nanchang, Jiangxi
mwwang@jxnu.edu.cn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Chinese euphemism. By using large-scale manually annotated corpus an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euphemism automatic recognition with high accuracy is realized.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uphemism in People's Daily from 1946 to 2017. From the view of large-scale data, the paper focus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s and social covariance of euphemism, and verifies the Gresham's Law and Law of succession on linguistics.

Keywords: Euphemism , Automatic recognition , Diachronic Linguistics , Social covariance of language

1 引言

委婉语在汉语这种高语境语言中，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语言是运动的、发展的，在高语境语言的传播过程中，大部分信息蕴藏于语境或内化于个人之中。这使得汉语委婉语现象不仅具有较高的复杂性，也具有时效性、变化性。Rawson (1981) 指出，委婉语具有时效

©2021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本论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1876074) ”基于概率度量空间的词表示及词语相关性度量研究”支持研究

性，有新陈代谢的特点，其自身的变化符合格雷什姆规律（Gresham's Law）和更新规律（Law of succession）的支配：格雷什姆规律源于经济学，又称“劣币驱逐良币”。束定芳（1989）将其解释为“词语中好的意义逐渐被坏的意义替代”，Rawson所提的两大规律具体表现为委婉语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随着人们对该委婉语本意的逐渐了解，委婉义逐渐减弱，最后被社会群体弃用、淘汰，被新的委婉语所替代。“从很多委婉语的诞生和消亡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两大规律的作用”。

语言具有社会性，其变化与社会息息相关，陈原（1982）指出：“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是另一个变数，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变化，这就是共变。当社会生活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委婉语作为社会交际的润滑剂，其发展变化不仅受两大规律的制约，也被刻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尤以新中国成立前后至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汉语委婉语与社会的共变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在汉语委婉语研究中，历时性研究往往是以典籍考据、例句例证的方式进行的定性研究，如李军华（2016、2018、2019）指导研究生团队从语义分类的角度，对委婉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历时性研究，构建了“古-今-现”的委婉语之间的对比；但历时性研究缺乏宏观的、大量数据支持的研究方法与实例，伍铁平（1989）曾提出：“……如果能统计一下，一篇文章、或者最好一部小说中各种委婉语占多大比重，并且调查一百个婉指词，它们各占了多少类委婉语，这种统计材料，将会有很大的价值……”，然而一直以来基于大量数据统计的方向未被重视。张辰麟（2020）采用多人人工标注的方法，对《人民日报》6万余句委婉语句子进行了标注，并构建了委婉语语言资源库，并使用统计方法初步达成委婉语自动识别。基于此语料，本文使用机器学习优化了汉语委婉语自动识别方法，并使用训练好的分类器对《人民日报》1946年-2017年语料中的委婉语句子进行抽取分析，从大量数据的角度，验证格雷什姆规律与更新规律对委婉语发展变化的影响，以及汉语委婉语与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共变性。

2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委婉语自动识别

委婉语多为多义词，其往往不仅有委婉义一个语义，如“离去”既可以表示“离开”，也可以充当委婉语表示“死亡”。因此，自动识别委婉语是进行大规模数据研究的第一步。张辰麟（2020）使用词表与统计的方法，将语义相似的委婉语划为一类，默认其上下文相似，初步实现了委婉语的自动识别，但精度不高。本文使用word-embedding的方法，选用Li（2018）训练好的《人民日报》词向量，句子向量则采用词向量直接平均和TF-IDF加权平均两种方式进行获取；分类器训练则使用机器学习中经典的KNN算法（K 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 K近邻算法）与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s, 支持向量机）两种训练方法；将embedding方法与分类器训练方法两两结合，共生成四种模型-融合策略：KNN + avg、KNN + tfidf、SVM + avg、SVM + tfidf。基于张辰麟（2020）的人工标注，选取了资源库中规模最大的一类委婉语语料：死亡类委婉语语料（11852个句子）来训练委婉语有监督分类器。

实验以十折交叉验证（10-fold cross-validation）进行，即将数据集分为10份，每次取其中9份作为训练集，1份作为验证集，并将实验进行10次。为了对比各个模型策略的效果，我们以准确率（accuracy）为基准，选择10次实验中准确率最高的结果，并展示其精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准确率（accuracy）、错误率（error rate）与F1值（F1 value），如果最高准确率有n个，则选取F1值最高的结果，经过试验，死亡类委婉语有监督分类器分类效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死亡类委婉语有监督分类效果

模型+融合策略	KNN+avg	KNN+tfidf	SVM+avg	SVM+tfidf
10*Test result(accuracy)				
round 1	0.9174	0.9191	0.9587	0.9503
round 2	0.9258	0.9266	0.9612	0.9494
round 3	0.9224	0.9191	0.957	0.9528
round 4	0.9174	0.9115	0.9578	0.9452
round 5	0.9199	0.9182	0.9578	0.9401
round 6	0.9207	0.9174	0.9629	0.9503
round 7	0.9241	0.9207	0.9562	0.9477
round 8	0.925	0.9216	0.9578	0.946
round 9	0.9233	0.9157	0.9629	0.9519
round 10	0.9309	0.9224	0.9587	0.9503
Best Score(in accuracy)				
精准率precision	0.932	0.93	0.9586	0.945
召回率recall	0.7596	0.7531	0.8783	0.862
准确率accuracy	0.9309	0.9266	0.9629	0.9528
错误率error rate	0.0691	0.0734	0.0371	0.0472
F1值	0.8167	0.8102	0.9131	0.8972

根据实验结果，SVM + avg的模型-融合策略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和F1值，因此本文使用该模型-融合策略训练分类器，以自动识别委婉语，并进行委婉语历时性研究。

3 委婉语历时性变化发展与社会共变

《人民日报》语料库包括自1946年6月创刊以来至2017年10月的所有新闻语料（缺少1982年8月至12月，1987年5月至1991年12月的语料），语料来源自《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总数据量达4.15GB，语料规模为15亿余字，包含新闻数量为1,730,275条。

3.1 委婉语句子抽取与自动识别

本文使用张辰麟（2020）标注的汉语委婉语资源库中死亡类委婉语词表作为关键词，对历年的《人民日报》语料进行句子抽取。由于张辰麟（2020）中使用的语料是2014年《人民日报》的语料，故不再重复抽取2014年的委婉语句子，经此步骤，死亡类委婉语共抽取到1062820个句子，历年句子规模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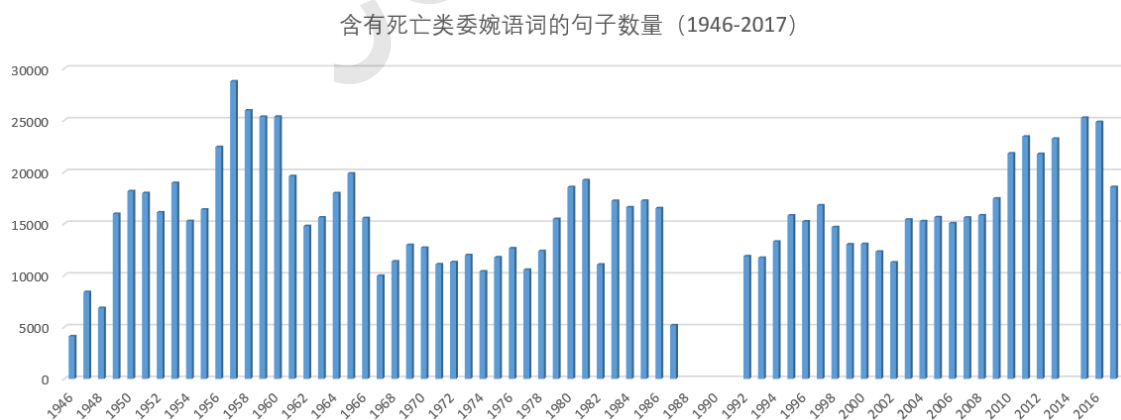


Figure 1: 死亡类委婉语历年句子规模 (1946-2017)

我们对所有抽取到的句子进行embedding操作,句子向量的获取使用词向量算术平均 (avg)的方法，并使用上文提出的基于SVM + avg模型-融合策略训练的有监督分类器对委婉语进行自

动识别，并从每一年的句子中随机抽取90个句子人工复核自动识别的准确率，历年自动识别准确率展示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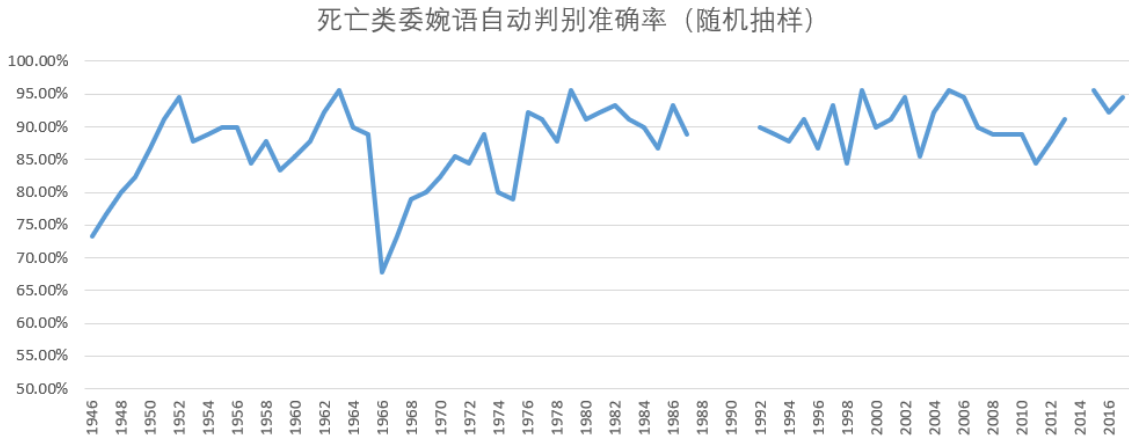


Figure 2: 死亡类委婉语自动识别准确率 (随机样本数: 90句/年)

从抽样-人工复核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年份语料委婉语自动识别率在85%以上，基本能够符合研究要求。识别准确率大致与时间相关，即总体趋势为越靠近训练集语料（2014年）的语料自动识别准确率越高，建国初期（1946年-1950年）自动识别率较差，随后逐年变好，这也侧面印证了语言的运动性。1966年-1976年自动识别率陡然下降，这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语言系统与语言生态的破坏有极大的联系。1978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语言生态发展逐渐趋于稳定，识别准确率的变化也逐渐趋于平缓。

3.2 委婉语历时性分析

委婉语受到格雷什姆规律和更新规律两大规律的影响，同时与社会呈现共变关系，然而，这两种影响涉及到的具体层面是不同的。陈原（1982）所述社会的“渐变与激变”是宏观的，涉及到的是对一类语言现象或语言单位的总体影响；Rawson（1981）所述的格雷什姆规律和更新规律是微观的、具体，是描述单个词语的发展、变化与消亡的规律。以下将以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详细论述委婉语与两大规律、以及社会变化的关系。

3.2.1 委婉语与社会共变

为了从宏观角度研究死亡类委婉语，我们首先将死亡类委婉语作为一个整体，统计1946-2017年抽取到的死亡委婉语句子总量、自动识别为委婉语义的句子数量，从句子数量、句子占比两个维度，并分别以堆积面积图、百分比堆积柱形图的形式展示于图3、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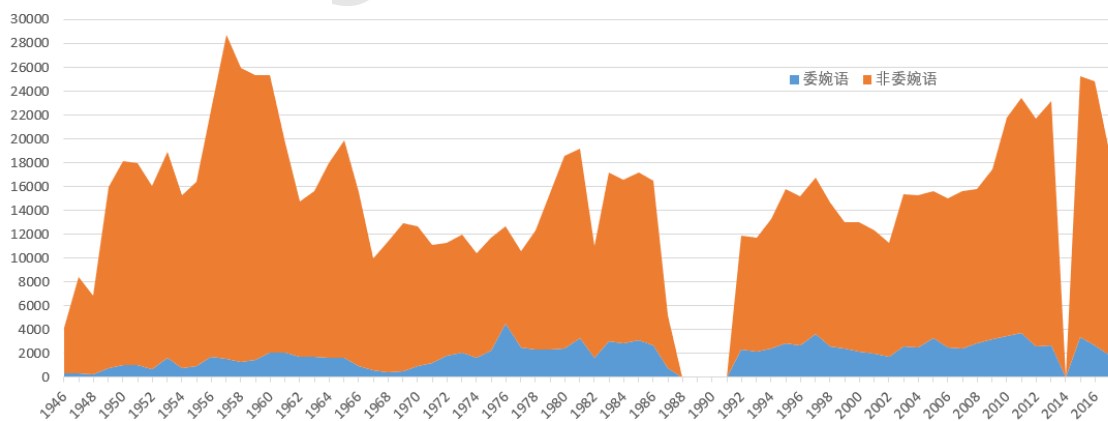


Figure 3: 死亡类委婉语使用频数 (1946-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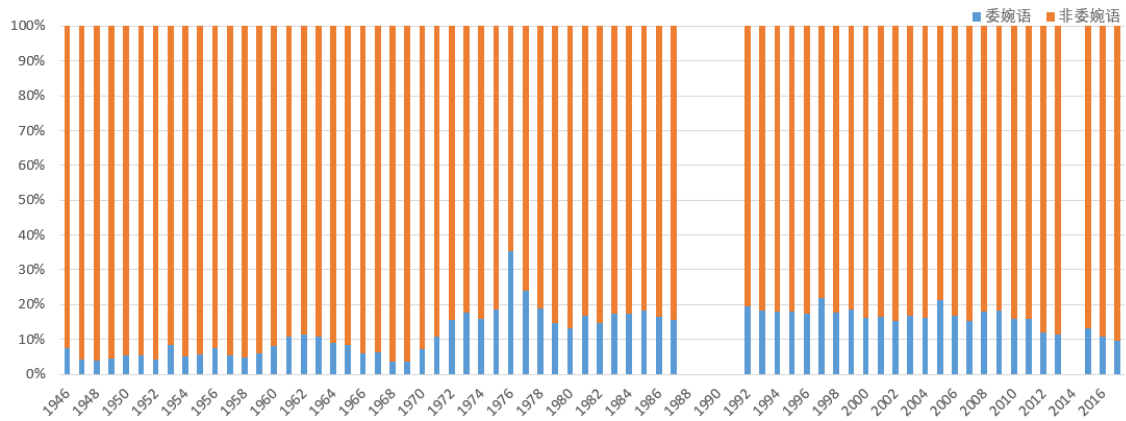


Figure 4: 死亡类委婉语委婉义占比（1946-2017）

在新闻领域，“死亡”这一概念常与“战争”、“灾难”共现，1946年以来，我国较大的与“战争”和“灾难”相关的事件多集中于1990年以前，主要包括：

- 1949年10月1日解放战争取得阶段性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1950年10月-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
- 1958年8月-10月金门炮战
-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
- 1962年6月-11月中印自卫反击战
- 1965年6月-1973年8月援越抗美战争
- 1966年5月-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运动
- 1969年3月珍宝岛战役
- 1974年1月西沙海战
- 1979年2月-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地区性冲突持续至1989年）
- 1988年4月南沙海战

我们将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轴重叠在面积图与柱形图之上，并对局部进行放大，如图5、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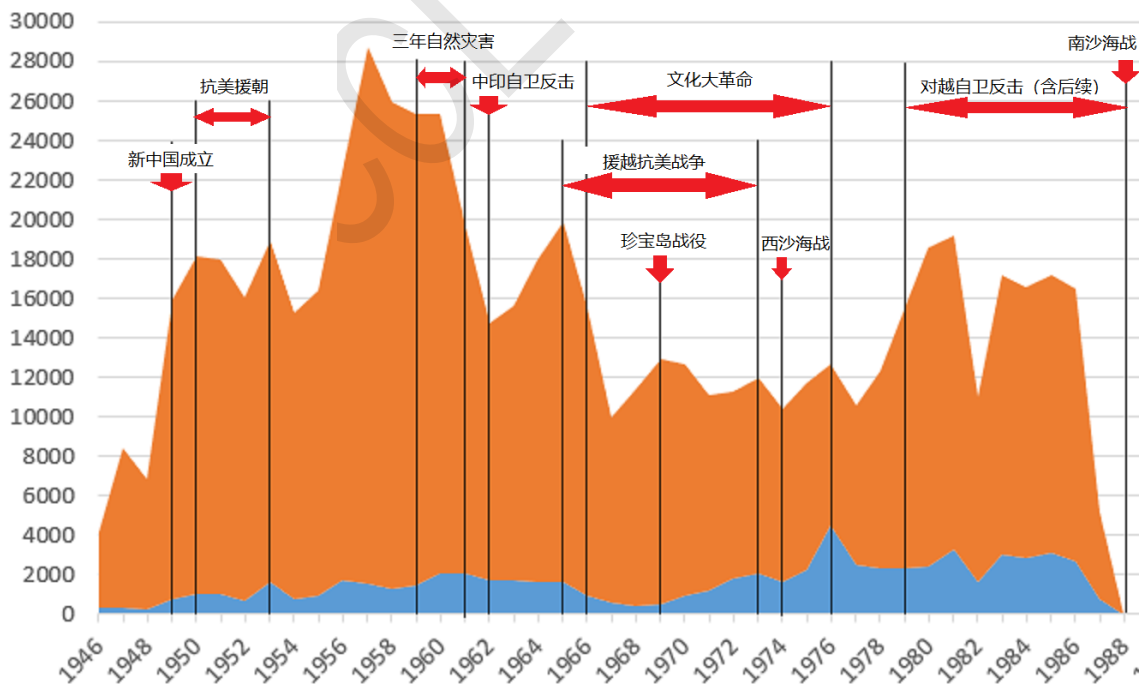


Figure 5: 死亡类委婉语使用频数（1946-1988/叠加社会重大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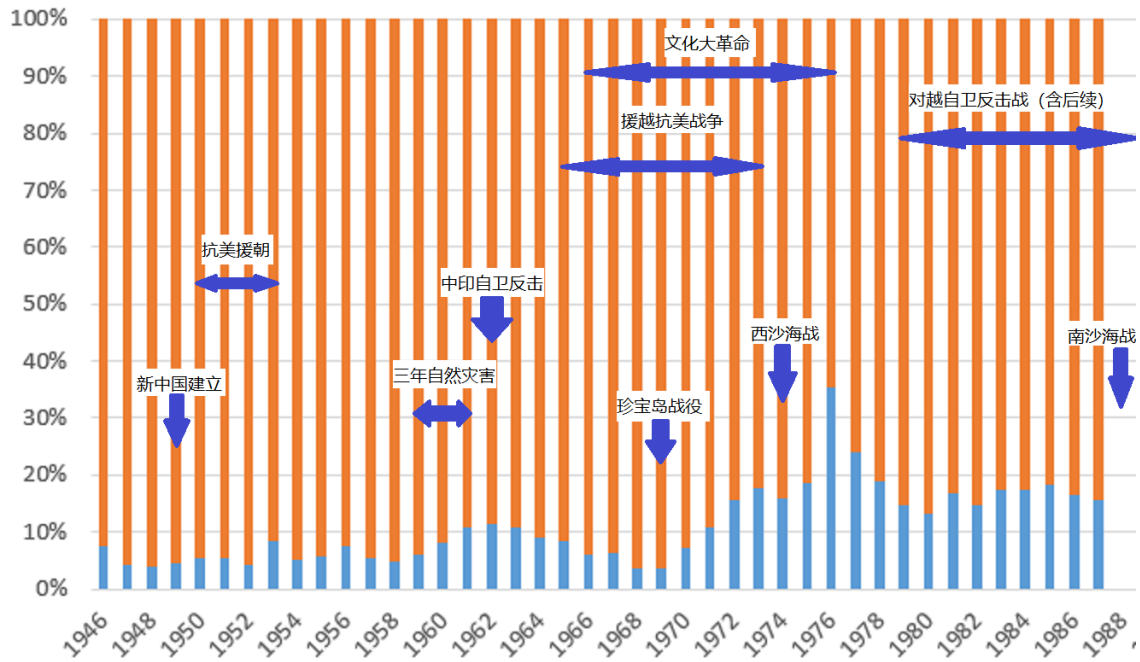


Figure 6: 死亡类委婉语委婉义占比 (1946-1988/叠加社会重大事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解放战争也逐渐接近尾声。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真正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人们也逐渐开始总结战争经验，缅怀革命先烈。媒体树立悍不畏死的革命榜样，为人民群众建立自信心与自豪感，并鼓舞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胜利。在1949年之后，可以看到死亡类委婉语使用的频数开始逐渐上升，人们开始逐渐倾向于用委婉的方式描述惨烈的斗争与死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志愿军奔赴朝鲜进行自卫反击战，经过五次战役，在1951年末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战场上逼到了谈判桌前。因此1950年至1951年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频数和委婉义所占的比率依旧稳步维持在近几年内的较高水平，1951年后该曲线有所下降。1952年下降尤为明显，此时朝鲜战争处在边谈边打的胶着状态。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赢了新中国立国之战。关于战争结束的总结性报道与话题成为了热点，因此关于死亡类的委婉语的运用达到了局部峰值。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死亡类委婉语因为灾害的严重影响，使用率有较为明显的上升。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爆发，但由于该战争持续时间较短，且交战双方伤亡比例差距悬殊。因此，虽然死亡类委婉义占比依旧在稳步上升，死亡类委婉语使用的频数变化不大。

1965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部队应越南劳动党请求，无偿帮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援越抗美战争爆发，然而，紧接着1966年5月中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内乱时期。文革是对语言文化发展的一场浩劫，文革时期的语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大量的“语言暴力”、“攻击性言辞”、“詈骂贬谪性的语言”甚嚣尘上。而委婉语作为一种婉转、内敛、避免尖锐矛盾的表达方式，在该时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从图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不论是使用的数量还是委婉义的占比，都处在整个委婉语发展变化曲线的“波谷”，在文革最严重的1968年-1969年间，委婉语的运用几近跌落“谷底”，两年的《人民日报》全年均有10000条左右的新闻，语料也均为1200万字左右，这与前后五年的语料规模差距不大，但是委婉语的使用状况却有异常大的变化，死亡类委婉语使用的绝对频数仅有419次和487次，且委婉义占比不到5%，远低于其他年份，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几近绝迹。1970年后随着整风运动的进行，社会秩序开始逐步恢复，委婉语的使用频率也开始逐渐上升，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8月援越抗美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部队开始回国，同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着手纠正极左思想。因此，当年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达到一个小的峰值，一方面是对援越抗美战争的总结，使用到了大量的死亡类委婉语

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另一方面，语言生活秩序的稳步恢复，使委婉语再次回到了人们的日常语言生活当中。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终于结束，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也开始逐渐得以平反昭雪。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频率和委婉语义的占比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人们不再使用直白的、粗俗的、有攻击性的语言进行交际和社会评价，而是选择大量使用委婉语，用婉转、礼貌的语言形式，互相尊重、宽以待人地进行语言交际，这是社会秩序和语言文化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的重要体现。

1976年之后，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频度逐渐稳步下降，至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但3月主要战役便宣告结束，因此没有给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造成较大的影响，尽管此后对越局部地区冲突一直持续到1989年，但并非大规模冲突，因此，其中除1982年《人民日报》因缺失部分语料导致委婉语使用的绝对频数较低，1976-1987年间委婉语的使用频数和语义的占比基本都比较稳定。

1958年金门炮战、1969年珍宝岛战役、1974年西沙海战则因为都是小规模局部战役，因此对死亡委婉语的历时性变化发展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1988年南沙海战则因为语料数据的缺失无法进行分析，但南沙海战也是小规模局部战役，对死亡委婉语的变化发展应该也不会有较大的影响。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人民日报》也逐渐开始从主要聚焦政治问题转变为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语料的话题开始分散，并逐渐多元化，2000年以后《人民日报》的板块逐渐丰富，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随着话题的分散，重大政治事件对某个特定委婉语类的影响开始逐步变小，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信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社会事件对语言系统造成的影响，也会由于语言系统自身更新速度的加快而逐渐变小。因此1998年大洪水、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轰炸、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爆发、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2010年H1N1禽流感爆发都没有对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造成较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语料总量和话题总量的激增造成的分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这些“灾难”和“冲突”所造成的影响，也再不可能达到共和国建设初期几十年内的“战争”和“灾难”对社会生活造成冲击的严重程度。但是从死亡委婉语总体的面积图与柱形图（图3、图4）上，依然可以看到1997-1999年、2008-2010年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频数和占比依然有小规模的上升，由此可见，社会的“渐变和激变”对语言，尤其是委婉语影响重大，语言的变化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和社会是共变的”，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的。

3.2.2 委婉语与格雷什姆规律和更新规律

格雷什姆规律和更新规律对委婉语的影响是微观的，故需要对单个委婉语的历时性发展进行考察，因此，我们依旧使用委婉语义的占比，即自动识别的委婉语义句子的数量占该词出现的句子总量的百分比，来考察单个委婉语的历时性变化情况。通过对1946年-2017年的《人民日报》语料的抽取，共抽取到98个死亡类委婉语共计1062820个句子，如果将每年的98个委婉语都展示在图表上，势必会因为数据太多造成混乱，因此，我们以“委婉义出现10次以上（计为 $TF_i \geq 10$ ）”作为筛选条件，将高频委婉语历时性变化情况展示如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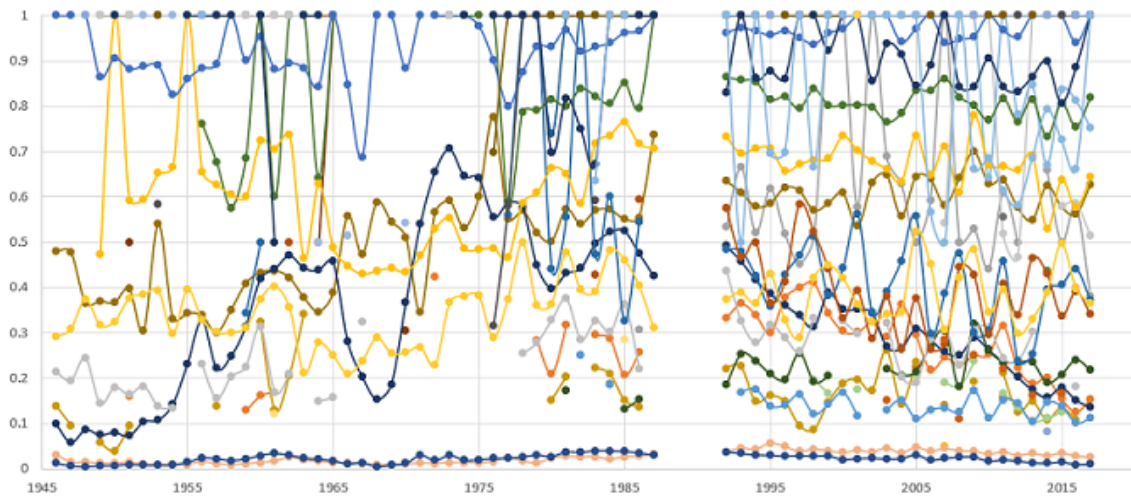


Figure 7: 高频死亡类委婉词委婉义占比历时性变化图示 (TF < 10/年)

委婉语的历时性变化类型，可以分为四类，以下将分类进行论述分析：

①委婉语义的占比一直都很低的委婉语：如上图中的紧贴0两根变化曲线，它们分别为“去”和“过去”，均为汉语常用词，在语料中出现的频次极高，作为委婉语使用并表示“死亡”义仅为极小概率的事件，因此委婉语义占比很低。

②委婉语义的占比一直都很高的委婉语：如上图中的紧贴1的若干根变化曲线以及若干散点，它们多为“逝世”、“遇难”、“殉难”、“自尽”、“与世长辞”等委婉语，只有一个义项，并不是多义词，只能表达“死亡”的意思，也只能作为委婉语使用，因此理想状态下它们的委婉语义占比应该一直为100%不会变化，但实际的数值情况，有一些词在某些年份委婉语义的占比低于了100%，造成这种小概率情况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分词错误、委婉语处于隐喻当中、委婉语自身处于命名实体之内、语料本身录入的错误等问题，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有监督分类器并不能达到100%的精度，也存在小概率的误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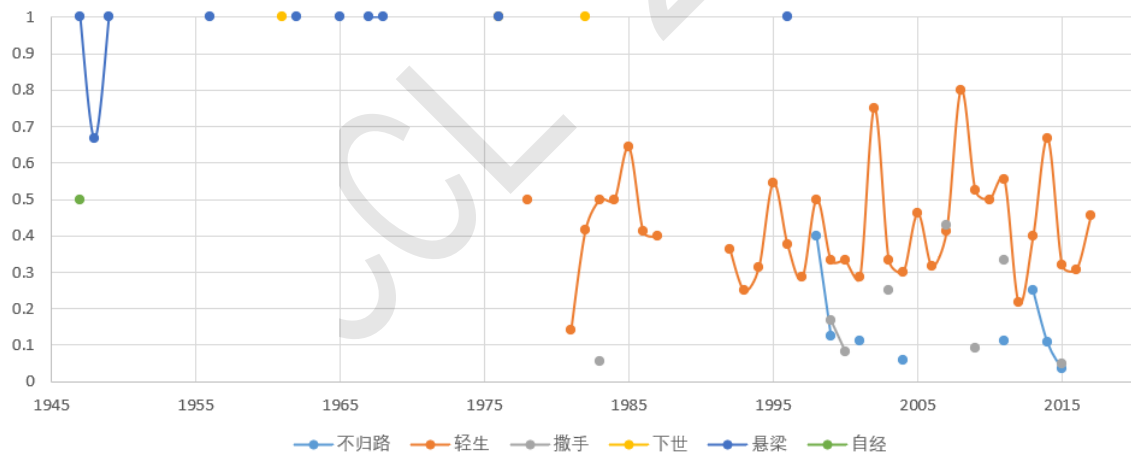


Figure 8: 新旧交替更新的死亡类委婉语

③委婉语义占比数据曲线存在断裂：特别是从某一时期开始，该委婉语才逐渐出现成为常用委婉语，或者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该委婉语就不再经常出现。如上图8中“不归路”、“撒手”、“轻生”等委婉语，都是1980年之后才逐渐开始出现，并承担委婉语功能。而“下世”、“自经”、“悬梁”等在2000年之后则不再作为委婉语出现。新旧委婉语之间的交替，体现了委婉语的时效性，同时也印证了“更新规律”对委婉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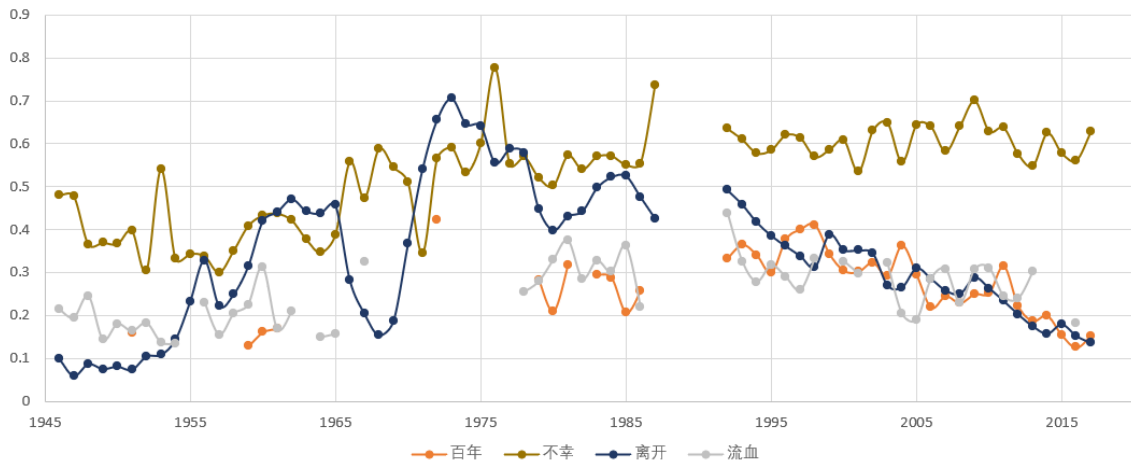


Figure 9: 长期历时变化的死亡类委婉语

④长期存在并且占比变化具有一定规律的委婉语，见上图9中的委婉语词，这些词语既是多义词，又是常见的委婉语。该类委婉语同时包括多个义项，能够直观体现出“格雷什姆规律”对委婉语的影响。随着该委婉语在语言系统中出现，并不断被使用，委婉语义占比从较低水平逐渐升高，到达一定的峰值之后，由于委婉语使用的人数过多，委婉义尽人皆知也就变得不委婉了，于是委婉义作为一个“婉转表达”的“好的义项”，其语义逐渐被“人尽皆知”的“直陈性”所取代，“坏的意义”驱逐了“好的意义”，“劣币驱逐良币”，于是人们开始尽量避免使用该委婉语进行委婉表达，该词作为委婉语使用的概率就会变小，委婉语义的占比就会逐渐降低。我们将此现象带来的委婉义占比变化趋势，形式化为“二阶多项式曲线”，并使用回归分析拟合出回归方程，以 R^2 值判断委婉语的发展变化是否符合格雷什姆规律。

我们将死亡类委婉语“离开”的历时性变化单独展示如图10，以便基于格雷什姆规律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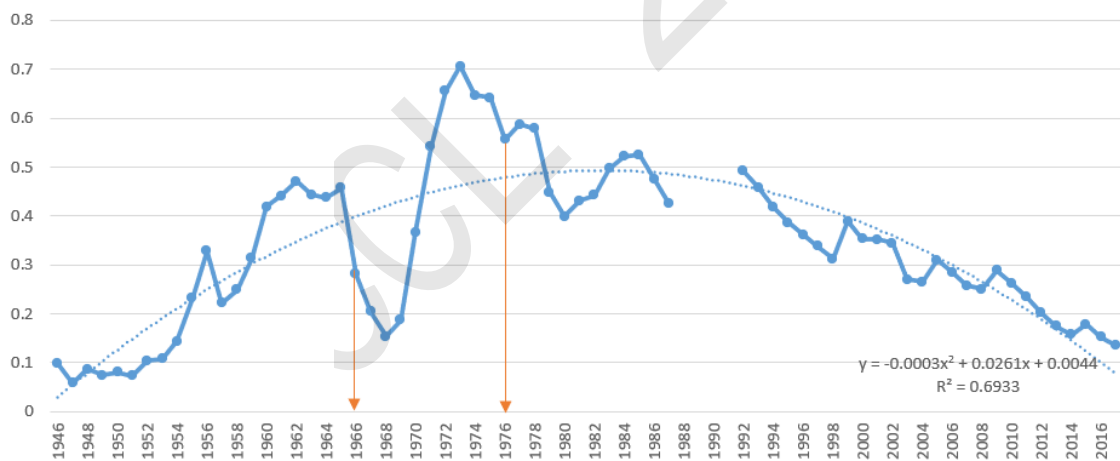


Figure 10: 委婉语“离开”的委婉义占比变化（1946-2017）

“离开”一词在《人民日报》1946年-2017年语料中一共出现过83140次， R^2 值为0.6933，数据变化基本符合二阶多项式曲线，但肉眼可见异端值基本出现在1966年-1976年区间当中，上文已述该区间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对语言文化发展的一场浩劫，严重影响了语言生态，委婉语现象在该时期受到的影响也极为严重。“格雷什姆规律”是一般性规律，不考虑严重的社会激变对语言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选择剔除1966年-1976年的数据并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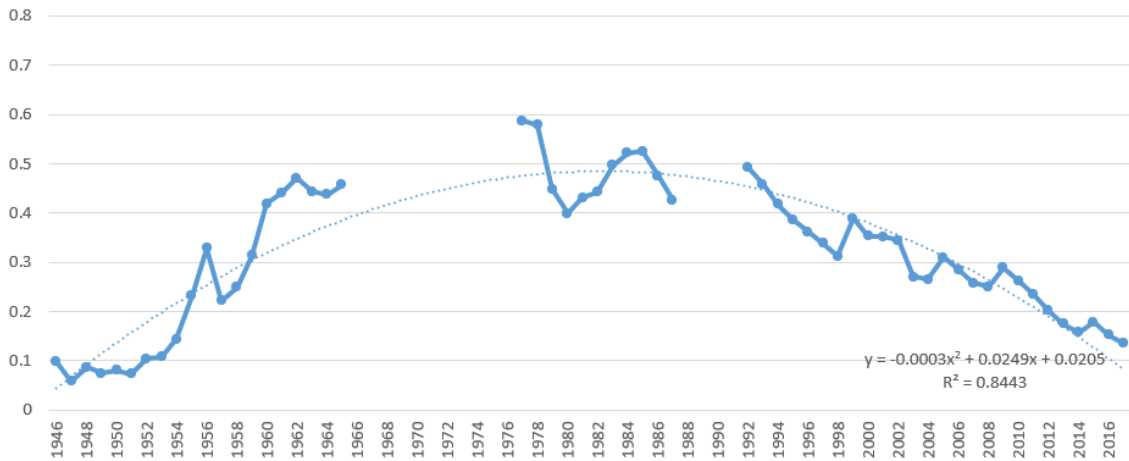


Figure 11: 委婉语“离开”的委婉义占比变化（1946-2017/去除1966-1976）

通过删减异常值， R^2 值得到了极大地提高，达到了0.8443，委婉语义占比的数据变化与格雷什姆规律呈高度相关，同样的方法可得同类其他委婉语的 R^2 值（如图12），从大量语料定量分析的角度，结合委婉语实例，基本可以证实格雷什姆规律的存在，格雷什姆规律对委婉语兴衰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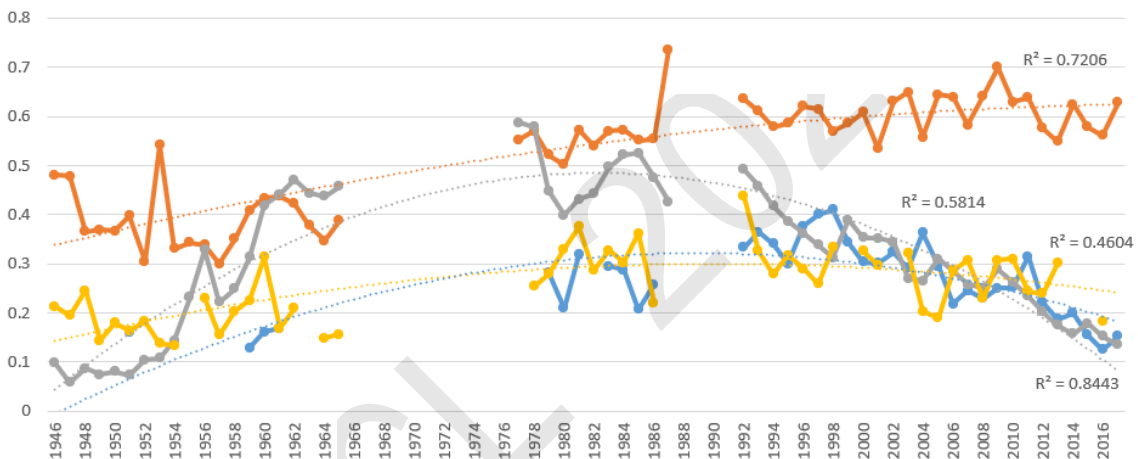


Figure 12: 同类委婉语二阶多项式回归曲线及 R^2 值

4 结语

本文结合自然语言处理相关方法，从大量数据的角度，对委婉语历时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使用《人民日报》1946年-2017年新闻作为语料，通过训练有监督分类器，实现委婉语自动识别，通过大量统计观察委婉语发展变化趋势，从宏观上，论证了委婉语与社会的共变关系，从微观上，结合具体委婉语词，从量化研究的角度，证实了格雷什姆规律与更新规律对委婉语的影响。介于篇幅限制，本文只能从最大一类委婉语入手，论证委婉语的历时性变化。除死亡类委婉语之外，我们还研究了恋爱与婚姻类委婉语，论证了该类委婉语与中国婚姻观念之间的共变关系，论证了从“包办婚姻”、“厂办婚姻”到“自由恋爱”的中国婚姻观念发展轨迹，对恋爱与婚姻类委婉语的影响，以及进入新世纪以后，大量盛行的“恐婚现象”对该类委婉语使用所造成的冲击，遗憾无法在有限的篇幅内分享。

就委婉语而言，有监督分类器对历史语料的自动识别精度仍需要提高，各大类委婉语的人工标注语料规模也需要进一步扩大，这样才能从定量的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委婉语现象。语言的历时性研究有利于揭示语言发展变化规律，对语言学研究而言意义深远。借助日新月异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结合语言学规律及先验知识，可以从定量的角度，丰富语言学研究的的外沿，为历时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方向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Rawson H. A Dictionary of Euphemisms and Other Doubletalk[M]. Hong Kong: Crown Publishers, Inc, 1981.
- [2] Li S, Zhao Z, Hu R, et al. Analogical Reasoning on Chinese Morphological and Semantic Relations[C]. 5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CL2018), 2018.
- [3] [美]爱德华·霍尔. 超越文化[M]. 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1.
- [4] 陈原. 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11.
- [5] 束定芳. 委婉语新探[J]. 外国语, 1989, 61 (3): 2
- [6] 陈原. 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生长和发展前景[J]. 《中国语文(北京)》, 1982.5.
- [7] 李军华, 郭定芹. 委婉语构造原则的认知阐释[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9 (2): 110-116.
- [8] 伍铁平. 从委婉语的机制看模糊理论的解释能力[J]. 外国语, 1989, 61 (3): 16-22.
- [9] 张辰麟, 王明文, 谭亦鸣等. 汉语委婉语语言资源建设[J]. 中文信息学报, 2020, 34(08): 32-40.
- [10] 刁晏斌. 略论“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04): 82-86.
- [11] 李春雁. “文革”时期的语言变异——以《战地新歌》歌词为例[J]. 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5): 52-54.
- [12] 刘苹, 李松. “文革”语言的研究对象及其反思[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2(02): 146-151.
- [13] 刘苹, 李松. “文革”语言特征研究述评[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3, 27(04): 77-81+98.
- [14] 赵静. 跨越历史的语言“转角”——《“文革”时期语言研究》刍论[J].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13(02): 326-335.
- [15] 孙海霞. 从评价机制看当代中国婚姻伦理观念的变化[J]. 兰州学刊, 2006(04): 158-160+157.
- [16] 张九莎. 汉语偷窃类委婉语研究[D]. 湖南: 湘潭大学, 2016.
- [17] 王琳. 汉语钱币类委婉语研究[D]. 湖南: 湘潭大学, 2018.
- [18] 武雅娜. 汉语指称年老类委婉语研究[D]. 湖南: 湘潭大学, 2019.
- [19] 赵红军. 汉语生育类委婉语研究[D]. 湖南: 湘潭大学, 2019.
- [20] 陈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姻伦理的嬗变研究[D]. 湖南科技大学, 2012.
- [21] 姚立迎. 新中国十七年婚姻文化嬗变研究(1949-1966) [D]. 首都师范大学, 2007.